

日本對殖民統治的「民族責任」與霧社事件認識 ：二次戰後日本國高中歷史教科書的分析為主

2011年9月10日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40・50年代的台灣（Ⅱ）」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村 平（Nakamura Taira）

1930年臺灣原住民族所發動的霧社事件，其影響迄今猶深。但是，日本的國高中教科書裡對此事件的敘述卻相當少，本稿將透過歷史觀點來分析此現象形成的過程與原因。日本文部（科學）省通過審定的教科書，高中從1970年代，國中從1990年代起，終於有了霧社事件的記載。此問題關係著日本對殖民統治的「民族責任」，本稿除了討論教科書的敘述之外，也將探究與教科書敘述所直接關聯的戰後日本歷史學的殖民地認識，以及民族認識問題。當前跨國境的學者和市民連帶（團結運動）中，進行了日中韓歷史教科書敘述的結合與整合，但臺灣被忽略（三澤 2010: 10, 272），這也更深刻化了臺灣中的minority的原住民族歷史被忽略的危險性。

過去以來，日本已有許多的研究書和文庫本的通史陸續提到了霧社事件，但是日本歷史教科書對此事件的記載，即使在2011年的現在也很稀少，而造成這種情況的理由，從歷史的角度看來，正與日本人的民族概念，以及有關殖民統治民族責任認識的稀薄有關。本稿將從民族責任的意識化與分有記憶的兩個切入點（契機），來探討克服這種現狀的方向。此兩者，雖然切入的觀點不同，但結果，都能建立起負起殖民統治責任的新主體。

I 從既存的研究談起

II 二次戰後日本國高中歷史教科書中霧社事件的認識

III 日本的霧社事件研究史與戰後歷史教科書中的殖民統治認識

IV 從對殖民統治的「民族責任」的角度來談教科書問題

I 從既存的研究談起

首先從兩個既存研究，來看日本歷史教科書對霧社事件與殖民地臺灣的敘述問題概況。

加藤榮一（2004）整理的有關殖民地支配的敘述：1950年代高中歷史教科書，如《再訂日本史》（山川出版社，1953年）只有1895年馬關條約與臺灣割讓的敘述，上原專祿監修《高校世界史》（實教出版，1955年）甚至沒有殖民統治臺灣的敘述。1970年代的日本史教科書，雖然開始有了把重點放在日本加害的殖民地支配的詳細敘述，但對臺灣支配的敘述比朝鮮來得少（同上:197）。1970年代後山川出版社一直維持著日本史教科書最高的市占率¹，比較其《詳說日本史》1976年、2002年、2003年的各個版本。1976年版沒有支配臺灣的

¹ 關於選定教科書市占率，參閱時事通信社《內外教育》；自 1997 年至 2008 年高中「社會科」教科書市占率，參閱君島（2009）第 8 章。日本教科書選定的方式，因地方行政單位而不同，但最近有教育委員會統合選定權的傾向，以橫濱市為例而言，2009 年把本來 18 個的選定區統合為橫濱市教育委員會的統一決定（但教育委員會考慮各區的情形，決定了各區不同的教科書），市民團體有各種的反應（俵 2009a, b，星

敘述。2002年版有殖民統治者的臺灣總督、總督府，以及「皇民化政策」等敘述。2003年版則出現了被殖民者，記載了統治初期「島民頑強的抵抗」或抗日武裝蜂起等事情（268頁）。但三個版本都沒有日本對臺灣統治的評價或總結（同上:199）。加藤認為，雖然最近歷史教科書的敘述內容有了變化，開始反省日本的戰爭、殖民地支配，但是對日本殖民地的相關敘述份量還是很少，而且斷片，幾乎未提及二次戰後殖民地的獨立對日本的影響，也未對日本的殖民統治有任何評價。

太田滿（2008）的〈日本歷史教科書中的臺灣〉一文，歸納整理了國中小高中的歷史教科書：1. 國小歷史教科書：分析2005年出版的4社課本說：「比起同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臺灣的敘述卻極端地少」。2. 國中歷史教科書：2006年出版的8社教科書中，有6社敘述了獨立運動與住民的抵抗，但只有大阪書籍一社有霧社事件的敘述²。3. 高中歷史教科書（世界史）：2003年的6社「世界史B」都沒有霧社事件的記載（太田沒有分析高中日本史教科書）³。義務教育階段的教科書對臺灣的歷史認識，僅限於臺灣曾經是日本的領土，因舊金山條約而放棄，國民黨遷移到臺灣。和朝鮮比起來對臺灣的相關記載實在少得太多了，不但很難了解日本在臺灣殖民統治的實況，也幾乎未觸及二次戰後的臺日關係。國小國中歷史教科書多半是，以沒有寫到二次戰中被美軍空襲喪亡的臺灣人為象徵，只記載「北到北海道，南到沖繩，這種戰後劃線出來的『日本人』的戰爭被害」（同上:20）。太田論文很清楚地指出，「殖民地時代的樣子」或「殖民地統治的實況」（同上:19）等殖民地支配的具體型態，如何當前歷史教科書中記載的問題。

為何要以教科書作為分析的對象？因為，學校教育在日本的殖民化與國民化中，擁有很大的意義：正如駒込（1996）指出，日本帝國的學校教育類似於西方帝國－殖民主義中的基督教和文明各種價值和自由貿易主義（其基礎是資本主義發展），以此三位一體為基礎的「啓蒙」。因此，敗戰前學校教育中的教科書負有相當重要的任務，試圖在宗主國與殖民地兩邊，灌輸殖民主義的意識型態；敗戰後，在持續以天皇制為象徵的日本社會體制中，和是否繼續或者脫離殖民主義意識型態的政治中，教科書依然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西川長夫（2006）論及殖民化與國民化之間重疊的邏輯，而教科書則是日本殖民主義與國民化重疊裡傳達中心意識型態的重要媒介，同時，在分離殖民地後的日本，教科書成了左右兩派在政治上攻防拉鋸的場域，持續是眾所矚目的鮮明焦點，以家永三郎教科書訴訟為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後述）。

儘管已經有許多研究書或文庫版通史提及霧社事件，但是，日本歷史教科書裡的相關記載，直到2011年的現在還相當地稀少。其理由是否因為，「帝國」崩壞後的日本人，對曾身為殖民者的民族責任之認識稀薄，本稿將從此觀點，詳細地探討戰後日本歷史教科書的霧社事件記載（抑或沒有記載的事實本身）。換言之，從日本殖民統治的「民族責任」來探討霧

2010）。

² 國中歷史教科書 8 社為：日本、東京、清水、教育、日本文教、大阪、帝國、扶桑的各社。

³ 高中世界史教科書 6 社為：山川、實教、帝國、東京、清水、三省堂的各社。所謂「A」「B」指的是，1989 年「學習指導要領」後對各科目所設置的，兩學分的「A」與四學分的「B」，一般而言，「B」課本比「A」課本厚且內容豐富。

社事件的敘述。民族責任的稀薄問題，應與民族意識的稀薄有關聯，本稿一方面探討為何近代以來日本被認為民族意識稀薄，一方面觀察考察日本如何負起對殖民統治的民族責任。通過國家審定（日語的「檢定」）的歷史教科書究竟如何敘述霧社事件，而此一歷史認識很明顯地反映出日本對殖民統治的民族責任問題。

II 二次戰後日本國高中歷史教科書中的霧社事件認識

在日本，最早提到霧社事件的教科書，據筆者的調查，高中應為家永三郎（Ienaga Saburo）撰寫的1974年《新日本史》（三省堂），國中應為熱田公等10人所編寫的1992年《中學歷史》（大阪書籍）⁴。家永最初通過文部省審查的教科書，是1952年申請審定的《新日本史》，除韓國合併外沒有殖民地朝鮮的敘述，而1955年申請的《新日本史》增加了殖民地朝鮮的敘述，若與其他日本教科書比較，在當時可說是前衛的敘述（君島 1996: 294-5）。後來家永三郎也出版了以一般民眾為對象的歷史書《新日本史》（1957年），該書對臺灣的殖民統治的實際情況，隻字未提，更不用說霧社事件了。甚至對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臺灣出兵」），使用了「征伐」的歧視字眼（236頁）。家永三郎的《審查不合格日本史》（三一書房），是家永1956年送文部省審定，1957年不合格之後把它直接出版的書，全書連索引在內，完全沒有霧社事件的記載，也沒有殖民統治臺灣的具體描述。1967年通過審定的教科書《新日本史》（改訂版），包括本文、索引、年表，都沒有霧社事件的敘述。「五四運動」與「萬歲事件」（不使用朝鮮的「三一獨立運動」詞彙），雖然是小字體但也算有記載（225頁），是同時期的教科書裡，唯一清楚地談到日本的殖民地支配與帝國主義侵略的教科書（君島 1996: 301-3）。這些中國和朝鮮的民族運動的敘述，在1974年版的《新日本史》裡，變成一般大小的字體，而且以小字體附加了霧社事件（後述）。換句話說，1974年版，「五四運動」與「萬歲事件」「昇級」到與本文同等的內容。家永的教科書，在1970年到73年間，學習到霧社事件而且也增加了敘述份量，以下將詳細地說明。1970年4月通過審定的《新日本史》（三訂版），包括年表和索引，都沒有霧社事件的敘述，幾乎忽略殖民地臺灣的存在，也沒有1974年使用《新日本史》所記載的「殖民地解放運動的展開」項目。但1970年的《新日本史》敘述了殖民地朝鮮的統監府或總督府，明確地給了它「殖民地」位置，與「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連結在一起敘述（212頁）。

1974年《新日本史》（三訂版）裡登場的霧社事件，內容有「高砂族」在「霧社暴動」等字眼：「在臺灣，漢民族進行著設置臺灣議會的運動。高砂族則因不耐於過重的勞力徵調而引發不滿，1930年（昭和5年）在霧社發生暴動，但受到飛機軍隊和警察的討伐，而被鎮壓」（257-8頁）。這段文字以小字寫在小標題「殖民地解放運動」中的「萬歲事件（三一獨立運動）」和「五四運動」之後。和1982年版不同的地方在於，沒有使用「霧社事件」的名詞，用的是「高砂族」（1982年版使用「原住民」，日語「原住民」具有savage意

⁴ 歷史學者家永三郎（1913-2002），父親是陸軍少將，1937年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國史學科畢業，經過舊制新瀉高校教授，1944年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二次戰後一向是東京教育大學文學部教授，1978年退休。1952年起長期從事高中日本史教科書單獨執筆，自1965年開始三次教科書訴訟，主張文部省審定制違反憲法等，一直到1997年才結審（支援教科書審定訴訟歷史學研究者會編 1998）。

涵)。1974年的《新日本史》是筆者所能確認的日本最早有霧社事件的教科書，記載在第11章「資本主義的發達與近代文化的成長」之2「政黨政治的發達與資本主義的成熟」中的小項目「殖民地解放運動的展開」裡。

家永在1970年到73年間增加了霧社事件的敘述，其契機之一應該是許世楷《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抵抗與鎮壓》（1972年）。家永在1978年3月刊的《新日本史：指導資料》（該訂版，三省堂）中引用了許書，這指導資料是為使用《新日本史》的高中歷史老師寫的，家永特別說明日本軍警鎮壓霧社事件時「殘忍的報復」是「與三一運動同質」（463頁）。此指導資料「殖民地解放運動的展開」中附上〈觀點〉，呈現家永的史觀：「日本至20世紀，不得不直接面對第一次大戰後民族主義的壓力。三一運動與五四運動無非是其歷史性高峰點。（改行）其中，特別是中國將其抵抗的主要目標由英國開始轉為日本的事實，預知了日本帝國主義該負擔的歷史命運，儘管如此，日本的支配層，基本上並未從民族主義學到任何東西。此事是15年戰爭悲劇的起因」（1987：461）。1974年版後的有關霧社事件的敘述，1982年版把「高砂族」改為「原住民」，用了「霧社事件」的名詞，但依然使用「蜂起」。1989年版、1994年版，除了漢字和平假名標記變更外，內容都相同，家永單獨撰寫的《新日本史》以此1994年版為止。1995年開始，家永與其他4名一起編纂《新日本史B》（三省堂），霧社事件的敘述，基本上沿襲之前《新日本史》的敘述，而這課本使用到2004年。

【家永教科書與其周邊】

1974年度使用的家永教科書開始記載霧社事件後，筆者在現階段所能確認的教科書中，開始敘述該事件的高中教科書有兩本——「學校圖書出版社」與「日本書籍出版社」的日本史教科書。學校圖書自1983年至1994年；日本書籍自1993年至2002年，敘述霧社事件。但，之後，這兩個出版社就沒有再記載了。

1983年永原慶二等6人合編的《日本史》（學校圖書），記載了「高砂族」的「叛亂」（索引也記載）：「1929年，在朝鮮光州發生日本人國中學生侮辱朝鮮人女學生的事件，擴大了朝鮮民眾的抵抗運動，同時在1930年，臺灣霧社的高砂族因不滿日本的統治政策，起而叛亂（霧社事件）。日本政府動員了軍隊與警察前去鎮壓」（292頁）。值得注意的是，永原將霧社事件與朝鮮光州學生運動（事件）結合在一起。根據文部省《教科書目錄》，永原等撰寫的由學校圖書出版的教科書，以1973年通過審定的《日本史》為最早，該1973年版尚未記載霧社事件，1977年通過審訂的《日本史》（改訂版）、1980年通過審定的《日本史》（再訂版）也沒有。因此可知，永原等人是在1980年後才增加霧社事件的敘述。1983年版後，1984年通過審定的《日本史》（改訂版）、和1986年《日本史》（改訂版），都沿用了與1983年幾乎相同內容的敘述，而這課本使用到1994年。

1993年通過審定由中村政則等6人撰寫的《高中日本史》（日本書籍），從初版起就有霧社事件的敘述，而後1998年通過審定的《日本史B》（二訂版），也沿用了1993年版的敘述。兩本書皆在「滿蒙開拓與殖民地支配」項中注釋：「在臺灣，1930年10月，台中州的高砂族抵抗日本的殖民地支配，進而蜂起（霧社事件）」（1993：304，1998：303）。

上述兩本高中教科書以外，其他教科書皆未有霧社事件的敘述。所以，家永三郎的教科書對霧社事件的敘述或許有些問題，但仍是首開風氣之作。山川出版社在1982年出版的《詳說日本史》（再訂版）都沒有霧社事件的敘述，其與家永版的差異在於，各章標題不使用資本主義概念，可見此概念的稀薄。同作者的教科書指導資料《日本史：教授資料》（改訂版）（1985年，山川出版社），雖然有744頁的厚度，但包括索引都沒有霧社事件的敘述。1982年帝國書院出版的《新世界史》（三訂版）、1982年三省堂的《日本史》（三訂版）也沒有霧社事件的敘述。1989年通過審定的三省堂《詳解世界史》也沒有敘述，但有殖民地朝鮮、和「亞洲、非洲的民族運動」（第V編第2章之4）的內容。1970年通過審定的秀英出版社的《新訂世界史A》（江口朴郎執筆）也沒有敘述。

【國中教科書】

本文已經在「I 從既存的研究談起」提到，2006年大阪書籍出版的國中歷史教科書有霧社事件的敘述（太田 2008）。在此對該內容作進一步分析，大阪書籍版自1992年通過審定本後，即開始事件的記載。很有趣的是，與一般人認為「高中課本應比國中課本詳細」的認知相反，但在高中歷史課本僅有上述三點敘述霧社事件的情況下，大阪書籍的國中歷史課本（2008年後統合為日本文教出版），將近二十年，到現在保持實質霧社事件內容的敘述。

2001年通過審定的大阪書籍《國中歷史》，在第4編第2章「兩次世界大戰與日本」第三節「世界恐慌與跟中國的全面戰爭」，在「民眾運動的興起與東亞」的「朝鮮與臺灣的抵抗運動」裡，雖然沒有使用「霧社事件」或臺灣原住民族等的詞彙，但卻實質地敘述了霧社事件。該書在1929年光州「學生鬥爭」「反日示威」之後，接著寫道「1930年在臺灣，一部分武裝人士，攻擊警察署和學校日本人。日本動員軍隊，甚至使用飛機轟炸、瓦斯彈進行鎮壓」（161頁）。在同一頁，登載了霧社事件的新聞報導。並有關於民族的敘述：「日本殖民地的朝鮮和臺灣，因社會不安逐漸升高，導致激烈的民族運動，動搖了日本的統治」（161頁），在此附加注釋：「1919年朝鮮的民族獨立運動的領導者們，集結於上海，設立『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試圖脫離日本而獨立。在臺灣，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興起了民族的自覺，1921年組成了臺灣文化協會」（161頁）。現行國中課本而言，這些敘述寫得很詳細，但因為被寫在受到世界恐慌影響下的「日本的不景氣」的敘述之後，所以，1929年恐慌前的殖民地體制本身擁有的「社會不安」的實際內涵，很可能被曖昧化。

1996年通過審定的大阪書籍的《國中歷史》，對於霧社事件寫道：「也在臺灣，先住民[照原文：中村]在1930年蜂起，襲擊日本人的警察署或學校」（249頁）。此位置在第9章「第2次世界大戰與日本」，2「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日本民眾運動的激烈化」中的小標題「朝鮮與臺灣的抵抗運動」的本文中。另外，該課本附了「臺灣住民的抵抗」的專欄，詳細說明：「1930年10月，在日本殖民地臺灣的霧社，住民因不滿過重的勞動，集結而起，襲擊警察署或學校。日本動員軍隊，甚至使用飛機的轟炸以及瓦斯彈，虐殺住民，徹底地鎮壓抵抗」（249頁），同一頁也登載事件的新聞報導（與2001年版同一個報導）。相較之下，1996年版使用「虐殺住民」「徹底地鎮壓」等詞彙，而上述2001年版的文筆則變得較溫和。

1992年版《國中歷史》在本文裡並沒有上述的敘述，只登載在上述同樣的專欄裡（249頁），根據筆者的調查，這應該是最早提及霧社事件的國中教科書。1992年版也沒有1996年版「朝鮮與臺灣的抵抗運動」的小標題。1992年版之前有，1986年和1989年通過審定的大阪書籍教科書，大部分的撰寫者不同，也沒有霧社事件的敘述。換句話說，大阪書籍的國中歷史課本，在1992年至96年間，明確地給殖民地抵抗運動一個位置，置入了霧社事件的敘述。

大阪書籍似乎在2008年度中倒閉，舊大阪書籍的教科書事業，自2009年度由日本文教出版社接手（參閱日本文教出版HP）。2009年2月出版的《國中社會：歷史領域》（大阪書籍印刷，日本文教出版）書中有關霧社事件的敘述，與上述2001年版類似，但與朝鮮光州學生事件寫在同一段文字：「日本的殖民地朝鮮與臺灣，社會不安加劇。朝鮮方面，1929年為抗議日本人學生侮辱言行，發生了光州學生事件；次年，臺灣霧社的住民因反對勞動，襲擊日本人的警察和學校。日本政府動員軍隊，進行鎮壓」（191頁，同時揭載與上述同一個新聞報導）。2011年通過審定的日本文教所出版的國中歷史教科書，部分沿用了舊大阪書籍的歷史教科書，雖然沒有記載霧社事件一詞，但和大阪書籍一樣，在專欄「近代史plus α：朝鮮與臺灣的抵抗運動」裡對事件作了實質的敘述（沒有本文中敘述）。其專欄沒有使用「民族」的詞彙，在1929年「光州學生鬥爭」後，「次年在臺灣的霧社發生事件，先住民[照原文：中村]武裝蜂起，被日本軍鎮壓」。同時登載上述同一個新聞報導，初次附上說明：這新聞「以歧視觀點報導抵抗運動」（223頁）。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知道，有關霧社事件的敘述，高中課本從1970年代，國中課本從1990年代開始。但問題是，這些前衛的敘述，並未影響到其他很多出版社的教科書，而使所有的教科書也開始敘述了霧社事件；反而，之後漸漸地沒有了敘述，2011年現在，只有國中的日本文教出版社有敘述，高中課本都沒有記載霧社事件。日本文教使用了「先住民」一詞卻未對此名詞有任何說明，如同歷年的教科書，缺少了對殖民主義歷史中「高砂族」或「原住民」等名詞的說明。目前日本很多文本對臺灣原住民族直接使用「原住民」，沒有明確說明原住民族「正名」運動的過程，看似回到原來具有savage涵義的日語「原住民」的使用方式，恐怕未來教科書記載也採用「原住民」一詞，此時教科書針對臺灣原住民族名稱的歷史演變與其社會背景，應該多說明給日本學生。

殖民地統治與霧社事件，為何如此不容易被日本的教科書記載？其最大原因，應該是日本人缺乏殖民統治的責任認識，本稿將在下一節探究此問題。在本節最後，我想跳脫這個層次的問題，簡單提及學校歷史教育的制度面和結構面，以及臺灣史範疇的成立問題。日本高中「世界史」（必修）和「日本史」（選修）的分斷教育，以及歷史教科書記述上的弊害，至今一直被批評指摘（中村 2004，鄭 2007）。日本殖民統治史，橫跨了世界史和日本史兩個領域，所以應該針對此一特質多加討論。另外，臺灣史研究長久以來因為政治上的各種理由，不管在臺灣或日本一直被忽視，直到1990年代才有「臺灣史」的研究範疇（ex. 1997年日本臺灣學會成立），成為日本教科書執筆者一向對臺灣史忽略的原因。

III 日本的霧社事件研究史與戰後歷史教科書中的殖民統治認識

日本史家們對霧社事件的評價，已經被井上清與鈴木正四在《日本近代史（下）》（1956年）一書中，以小標題定位為「殖民地民族的鬥爭」性格，書中描述了「日本帝國主義在本國發生階級鬥爭的同時，殖民地的反帝鬥爭也趨於激烈」（213頁），殖民地朝鮮在1929年11月開始的光州「反日運動」，1930年1月由朝鮮紡織釜山工廠擴及全國的罷工、佃農爭議、「農民暴動」，1930年5月30日間島發生的「反日暴動」，以及金日成等共產主義者的「武裝游擊鬥爭」（213-4頁）。接著寫道，「同樣地，在臺灣興起了民族運動。1930年11月在中部山岳地帶的霧社，發生了1,500名原住民的暴動，其導火線是對日警凌辱女子的憤怒。總督府不只出動了地上部隊還派遣飛機，燒光部落，才好不容易鎮壓下來。霧社蜂起的根本原因，在於帝國主義的入侵對原住民生活造成破壞。因此，雖然蜂起已被鎮壓，但是原住民仍持續反抗」（214頁）。此種敘述方式，也被井上清沿用在《日本的歷史（下）》（1966年），此書在2009年4月已經有60刷了。井上清對霧社事件的敘述，我們可歸納出幾點：1. 在帝國主義的背景下，大恐慌造成的經濟困境，導致殖民地民族運動激化，因而發生霧社事件。2. 以傳統生活被破壞的觀點，說明事件發生的原因。3. 採用「原住民的暴動」之歧視觀點（日語「原住民」具有savage意涵）。

另外，遠山茂樹、今井清一、藤原彰的《昭和史（新版）》（1959年），1997年已有58刷，也有霧社事件的記載：以井上清等採用的帝國主義和民族解放運動的框架下，把「暴動」的原因，歸於對警察行政的反感，以及勞力薪水的差別待遇（70頁）。其他早期的研究，有楊杏庭（1959）在歷史教育研究會《歷史教育》中文章可以注意，不過帶有歧視獨斷的散文性質濃厚。《岩波講座日本歷史》第19卷（1963）裡山邊健太郎的早期研究，令人矚目。至了1970年代，提及霧社事件的學界出版物增加了不少。包括了Nezu Masashi（ねず 1970）、加藤祐三（1971）、朴慶植（1971）、山邊編輯的史料集（1971）等的著作，但1970年代把這些成果寫在歷史教科書的，只有家永三郎一人而已。

此後霧社事件的研究，有戴國輝（1973）、中塚明（1976），而許世楷（1972）也提及了部分，不過，同時期以「民眾」生活為寫書重心的通史（西岡・鹿野 1971、鹿野編 1978），也有些書並未記載霧社事件。此時，淺田喬二（1973）將漢民族的抗日運動分為三階段：「臺灣的抗日民族運動主流，從阻止日本佔領臺灣開始的武裝抗日鬥爭，經大正期合法的中產階級（bourgeois）民族主義運動，進而到昭和初期勞工階級的民族運動」，「第三階段的主流是，結集於臺灣農民組合的農民們，其領導勢力是組織臺灣共產黨的勞工階級」（1973: 20），但臺灣原住民族並非其研究對象。

1980年代後，中川・和歌森（1980）、戴國輝編（1981）、向山寬夫（1987）、林 Eidai編（1995）、鄧相揚（2000，中文1998的譯書）、春山明哲（2008）、小松裕的通史的（2009）等，以及《臺灣學會報》有〈對臺灣原住民族的霧社事件〉特集（2010）（詳細文獻參閱北村 2010）。筆者個人認為，現階段對事件的研究課題，一方面該討論在「理蕃史」中的定位，以及從包含生活基礎變化在內的「臺灣原住民族史」的交界之處去追究霧社事件的性格。除此之外，筆者認為，應該進一步去探究世界史裡「去殖民」

（decolonization）運動的脈絡中，賽德克民族中各個不同的族群和女性等少數民（minority）經驗的觀點，以及多數民（majority）的責任問題（中村平 2009）。這幾年，有從賽德克族本身的故事去接近事件的研究，也有企圖使互相戰鬥的賽德克族內部和解的動向，同時需要的是，也探究日本政府和日本人的（國家與民族的）責任問題，在此銜接起來。

其次，換個角度，把霧社事件敘述的問題，放在日本戰後歷史教科書的脈絡中來討論，浮現出日本「進步」派教科書勢力與保守派的政治。日本從敗戰後，至1952年2月（1951年9月調印）舊金山和約生效為止，被盟軍佔領。佔領時期歷史教科書的主要特徵是，反省戰爭與強調民主化，對侵略戰爭和殖民地支配等對東亞的加害意識薄弱，對敗戰導致殖民地的喪失、海外軍人和民間人士歸國後的苦難等的關心也薄弱，而且，刻意淡化被佔領和喪失國家主權的事實（中村 2004: 4-5）。

君島和彥（1996）指出，戰後的歷史教育包括教科書和「學習指導要領」，基本上是遺忘了舊殖民地的問題。直到1980年代以後，日本史教科書才記載較多殖民地朝鮮的敘述（君島 1996: 268-9）。從此觀點來看，家永教科書在1970年代開始霧社事件的記載，雖然初期的表現充滿歧視性、殖民主義性，但是在日本教科書界裡也算是一種積極的嚐試。接著我們來看看，君島（1996）所整理歸納的戰後歷史教科書中的舊殖民地認識。敗戰後1946年出版的國定「國史」教科書有，國民學校使用的《我國的進展》（くにのあゆみ）和國中使用的《日本的歷史》（上下）等。這些課本排除了戰前主張「國體的本義」的皇國史觀，而家永三郎撰寫的《我國的進展》裡古代至平安時代，成了摒除神話敘述客觀事實之戰後歷史教科書的先驅。但是，總括來看《我國的進展》裡的日朝、日韓關係，不論是朝鮮民眾的抗日運動、鬥爭，抑或日本民眾責任的問題，全都付諸闕如（君島 1996: 277，參閱君島・坂井俊樹 1992: 209）。1947年最初公佈學習指導要領，甚至連「獲得殖民地的必然性」小標題的內容，都缺乏反省殖民地支配的觀點。換言之，日本戰後的歷史教育，是從缺乏反省殖民地支配的史觀出發的（君島 1996: 287-90）。審定教科書制度設立於佔領時期的1948年度，當時審定的主體是GHQ。

1955年，執政的日本民主黨⁵發行「該憂慮的教科書問題」的小冊子，攻擊帶有民主色彩的教科書（即「第一次教科書攻擊」，君島 1996: 第7章）。接著1956年創立教科書調查官制度，強化教科書的審定，因而被認為「將過去對戰爭的侵略性和加害性質的敘述，一概抹消去除」（吉田 2010: 153）。同時期的1952、57、63年，家永三郎的日本史教科書沒有通過文部省審定。家永下決心進入教科書訴訟，他在1995年回顧當時的心情說道：「教科書審定從1950年代後半開始嚴格，結果成為，與過去的國定沒有差異的嚴謹統制狀態」，「一連串不合格的審定結果，1963年、64年的審定也不合格，終於令人忍無可忍」（家永 1995: 98-9）。上原專祿等的世界史嶄新的嘗試《高中世界史》（1955），在1958年也沒有通過審定。1960年，日本有9個具代表性的歷史學會，共同發表「教科書審定制度該再檢

⁵ 日本民主黨是自民黨（自由民主黨）的前身，1954年從自由黨以鳩山一郎為總裁分裂出來，1955年再度與自由黨結合，組成自民黨（所謂55年保守合同）。

討」的聲明，並將該聲明交給文部大臣（君島 1996:第7章）。另外，國中小教科書的廣域選定制度，是依據1963年制定「教科書免費措施法」而成立。過去公立中小學校教員某一定程度擁有選定教科書的權利，但該免費措施法使政府掌握此權利，廢止每個學校的選定制度，而且，教科書出版的點數減少，對較大資本的教科書公司比較有利（孩子與教科書網路 21 2008: 34-5）。

1970年，東京地方法院杉本裁判長，接受家永的意見，判定對家永教科書的審定違反憲法和法律。另一方面，保守派則動作頻頻，1979年末，自民黨與財界、筑波大學校長開始聯合攻擊教科書，文部省也強化審定（所謂「第二次教科書攻擊」）。1982年教科書審定的結果在國際間引發爭議，遭到中國和韓國的批評，於是在教科書審定基準裡加上了「鄰近國條款」，試圖取得鄰近國家之間的理解和協調（君島 1996:第7章）。家永因露骨的審定內容，在1984年進行第三次教科書訴訟（同上: 314）。總而言之，戰後歷史教科書的審定，一直處於保守與革新的拉鋸、左右勢力的緊張關係之中。

【殖民地敘述的動向：三省堂《新世界史》】

1970年代由土井正興、小倉芳彥、阪東宏、小島晉治撰寫，三省堂出版的《新世界史》，刻意強調民族解放運動、日本的侵略和加害的特色。一般認為，山川出版社的《詳說世界史》也採納了他們部分的敘述（毛戶 2004: 119）。這些執筆者們的教科書，自1964年（《高中世界史新訂版》）至1995年（《新世界史三訂版》）的30多年間一直被使用，不過都沒有霧社事件的敘述。為何意識到民族解放運動和日本的侵略，卻始終無法記載？讓我們從章節結構和執筆者的回顧來探討。

1963年通過審定的《高中世界史新訂版》，有「亞細亞的民族運動」項目，也有中國五四運動和五三〇事件（1925年）的敘述，但沒有朝鮮民族運動的敘述。1966年通過審定的《高中世界史改訂版》，在「亞細亞的民族運動」中，以較小的字體寫「朝鮮的民族運動」（221-2頁），記載了「要求獨立的運動（三一運動）」（222頁）。1972年通過審定的《新世界史》，第IV部「現代的世界」其序章是「帝國主義與民族運動」（192-5頁），提及以20世紀的民族運動，是現代世界很大的特色之一。增加了1909年安重根暗殺伊藤博文（199頁）、1919年「獨立宣言」和三一運動（209頁）等，朝鮮民族運動的記載。除了解說，還在卷末史料中加了「三一獨立宣言」（279-80頁），雖然別的研究者指出且批評這是別的史料（和田 1976），不過還是沒有霧社事件的記載。

1984年通過審定的《新世界史改訂版》記載臺灣的民族運動，在「主題學習」整理了「亞細亞民族運動的三個時期與各時期的特徵」（272-3頁），積極主動地面對這課題。對於臺灣則寫到：「辛亥革命興起了民族的光榮感，辛亥革命前後所發生的前仆後繼的武裝蜂起，雖然受到嚴格地鎮壓，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爭取自治權的運動、或文化運動卻成了主流」（245頁）。但該書的本文、索引、年表都沒有記載霧社事件。1988年通過審定的《新世界史三訂版》被使用到1995年，雖然取消了「亞細亞的民族運動」的項目，但在主題學習「19世紀的世界」中，提及近代化和殖民主義、革命和民族獨立運動的糾纏關係（259-

60頁）。另外，別的主題學習「亞細亞近代史中日本的位置」，以「『大東亞戰爭』與東南亞細亞」的專欄，敘述了各地的抗日運動（240-1頁）。土井等人撰寫，由三省堂出版的《新世界史》，從60年代到90年代長期間被使用，也是對民族運動特別關心的教科書，但是始終沒有導入霧社事件與臺灣原住民族的觀點。

【《新世界史》執筆者們身為日本人的殖民地認識】

1978年，專攻中國近代史的小島晉治（1928-），認為自己過去執筆撰寫的高中世界史教科書（上述三省堂），對殖民地朝鮮的敘述內容太淺薄，是因為「舊殖民地支配民族的遲鈍感（原文為鈍感）」¹。他認為，從1955年日本民主黨提出的小冊子「該憂慮的教科書問題」開始，「批評國外帝國主義是可以的，但批評日本的不行，在這種原則下文部省的審定工作，其實比較像是檢閱，也許是這種狀況造成了自己寫作上的自我設限。或者，當時自己認為，合併後這些史事應該放在日本史裡處理。但是，現在我認為決定性的是，身為舊殖民地支配民族的遲鈍感，妨礙了我對事情重要性的認識」（小島 1978: 208-9）。這種「遲鈍感」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一向不得不敏感的是原住民族，以及被殖民者。其實思考這個問題本身就是，日本人“unlearn the privilege of”（「重新學習去掉特權」）過去殖民歷史的過程（Spivak 1988），也是野村浩也（2005）所說的克服「無意識的殖民主義」的關鍵。其實問題在，身為日本人的主體形成過程，也是日本人卻刻意不去看、不想知道的包括殖民暴力的歷史過程。另外，同時期，小島又編輯撰寫了《中國人的日本人觀100年史》（1974年），參考了戴國輝（1973）等人對霧社事件的描述，小島書中也有「高山族的抵抗『霧社事件』」文章（117-8頁）。儘管如此，小島等人的三省堂教科書，在1974年後也沒有霧社事件記載的痕跡。

另一位三省堂高中世界史的執筆者，專攻古代羅馬史的土井正興（1924-1993），曾經受過歐洲中世紀史家上原專祿《民族的歷史自覺》（1953年）的影響，但還是在1988年說「我們對民族問題的認識過於粗淺（原文為「認識の甘さ」）」（土井 1988: 21）。1962年，土井任教的法政大學附屬第二高中（在川崎市），在校園的文化節時發生在日朝鮮人的殺人事件，土井與同僚受到此事件的刺激，開始反省與回顧殖民地朝鮮和在日朝鮮人的歷史，進而在高中教育中實踐（大槻 1963，參閱佐伯・土井 1963）。其實，土井等人在此事件後受到朝鮮的中高級學校的關係者的嚴厲批判：「因為日本一味地追隨美帝國主義在極東進行戰爭和殖民地侵略政策，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文化造成反動化、軍國主義化，受限在這種體制下的學校經營，最終導致此事件」（1962年11月7日抗議文，同上:19）。法政第二高中的任教經驗深深地影響了土井，土井甚至在別的地方說，使我的歷史教育觀有了180度的大轉彎。（原文為「コペルニクスの開眼」，哥白尼式的轉變）（土井 1976: 307）。土井引用西島有厚的論文〈關於歐洲中心史觀和日本中心史觀的批判〉（1966年），來批評以歷史學研究會為中心的戰後日本的史學界，土井說：「上原專祿的書裡所看到的歐洲中心史觀，若沒有反省日本對亞洲諸民族的侵略和支配的歷史，換言之，若不與日本中心史觀結合的話，是無法克服的」（同上:137-8）。土井雖然如此主張，但是他和小島一樣都沒有注

視到臺灣原住民族史，換言之，這些軼事說明了，儘管是「進步的」日本歷史學者，也深刻地受限在日本殖民主義視野中。

IV 從對殖民統治的「民族責任」的角度來談教科書問題

敗戰後日本的左派或「革新」民族或國族主義（nationalism），往往主張「日本民族」的主體建構，以對抗日本保守政治（小熊 2002）。但是近年的研究漸漸釐清了，他們所謂的「民族」概念是有侷限性，並沒有身為殖民者的民族意識，又沒有明白地意識到殖民地統治的責任（尹 1997，2007，中野 2004，2005a-d，2006a-d，額額 2008）。而且，日本敗戰後的左派民族議題，一向缺乏原住民族（indigenous people）權利的觀點（參閱太田 2008a，b）。上面所看到小島晉治和土井正興的例子，也應該放在這種日本戰後思想的框架來討論。

在此簡單說明一個假設性的框架。「日本戰後的民族主義，是敗戰和佔領之衝擊所形塑的，而敗戰觀念中，充滿濃厚的對美國的敗戰意識，所以日本民族的自覺，不是面對亞細亞諸民族而形塑的。基本上，從明治時期開始的殖民統治以來，日本人沒有把亞細亞的諸民族視為有自治權的異民族。二戰後，支持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日本左派勢力，傾向以支持共產主義的觀點來認識中國民族，卻不從飽受戰爭侵略的觀點來看中國民族，甚至因而忽視了臺灣民眾史。這些狀態，長久以來曖昧化了日本的殖民統治責任和戰爭責任，日本民族的自覺也因此無法和亞洲諸民族產生聯結。」例如，額額厚（2008）也指出：「日本對臺灣以及朝鮮的殖民地統治支配的責任、或殖民主義的意識很稀薄」，「戰後的日本人並不關心，被殖民地的人們是如何持續地反應或者反抗著曾經受日本統治的經驗。（略）於是只殘留下一種殖民地好像已『自然消滅』的感覺」（同上：10-1），他因而呼籲應該建構「恢復記憶」的和平思想。日本歷史教科書的執筆，相當程度地反映了日本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以及左派民族主義的限制。上述的殖民地認識和持續缺乏對殖民主義的批判，不只是日本而是有世界史性的結構因素，這種結構在近年去殖民化和殖民統治責任的討論中，開始釐清了（板垣 2005）。其結構原因是，帝國宗主國的知識份子，仍陷在殖民主義式的認識框架，未尚從相對的觀點來看問題。

前一小節討論了「舊殖民地支配民族的遲鈍感」（小島），以及在日朝鮮人的歷史關聯「我們對民族問題的認識過於粗淺」（土井），從當前日本教科書幾乎沒有記載霧社事件的事實來看，依然未克服小島和土井等人在歷史認識上的缺陷。這個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日本人對自己的民族是殖民地支配者的事實毫無認知，也因而缺乏了對民族責任的認識。

當然這裡還有一個問題，和殖民地朝鮮的認識比起來，殖民地臺灣的研究，在戰後日本更被逼到一個微不足道的位置。松永正義（2008）引用戴國輝的研究指出：在1960年代至1972年日中恢復邦交時期，美帝影響下的臺灣研究被視為一種禁忌。身為過去的宗主國，如何面對殖民地是極大的問題，日本的政界、學界、民間，在戰後初期的十幾年間都缺乏這個問題意識，不只「忌避」談臺灣，甚至認為「進步的知識份子不談臺灣」（川島 2009：33-4，參閱森 2001）。

另外一個問題是，日本的殖民主義的性格雖然是歧視性，但也有同化主義的傾向（Wu 2003），這種特質，也許不容易讓殖民者形成清楚的民族意識，甚至曖昧化了民族責任的認識（參閱柄谷 1993）。當然，不能把這些理由當作教科書不記載霧社事件的藉口，反而應該克服這些問題。在此論及「民族責任」，是在分別「民族」和「國家」責任的基礎上，也是爲了日本人追求殖民統治的「國家責任」上需要的。民族責任是「身爲日本民族或日本人的責任」，這個「身爲」把主體的先驗性當作其前提，也許會被誤解而指責成，這種民族責任的論調只是國族主義（nationalism）的重覆而已。

但是所謂的認知責任，或是負起責任的狀況或行爲，並不是要建立國族主體性的運動。正如中野敏男（2001）所說，認知責任，是分裂既存主體的行爲。因此，認知責任進而負起責任的「行爲」，和脫離社會具體脈絡的「身爲日本民族的責任」的「命題」本身，是兩回事。因爲「所謂責任，是指遇到他者的時候，從自身內部的同一性和主權性分裂出一種關係。在此意味上，必須先有『主體的分裂』才能遂行負起責任」（中野 2008: 97），所以和以擁有均質的時間和共有的文化爲邏輯的國族主義（Anderson 1991），是不同的。

筆者以暴力記憶的「分有」（法文partage）爲切入點，探討既存主體在分裂中所負的責任（中村 2008a, b）。暴力記憶的分有，不是只靠意識就可以主動達成，而是必須在與他者對面的狀況之下（這並沒有否定在閱讀小說或民族誌等文本時出現的「對面狀況」），換言之，暴力記憶的分有必須在具體的狀況中，被動地等待來自他者無法預期的契機。這種與他者具體地編織出各種具體關係的時空，應與Anderson講的「均質」的時間和「共有」的文化不同。既存的主體一旦分裂，有可能會陷入混亂的狀態，但混亂並不一定完全是負面的狀況，不迴避這種混亂，面對過去所發生的暴力，以安慰過去的形式給它語言，努力把這種狀況導致「重新學習去掉特權」（Spivak）。這種倫理，也許可以參考Keenan（1997）所說的，倫理並不是一種有踏實基礎的對應，而是一種如何面對當自己的基礎被他者批評時的問題（中村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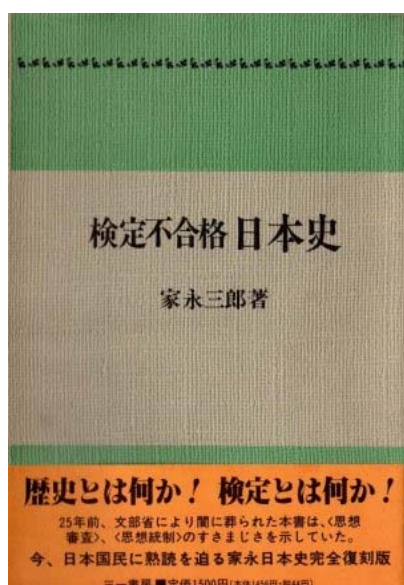
記憶的分有，特別是暴力記憶的分有，是分裂自己與主體的。如果把理性且確立自我的市民個人當作近代性的主體，分有記憶而負起責任的人就是超近代（或非近代）的主體了，當然那也和每個人對主體一詞的定義有關。日本人在尚未徹底近代化時，就開始殖民統治，在推動市民的團結和運動（連帶）時，以記憶的分有爲方法來負起民族責任，也許在推動日帝的去殖民運動論上是很重要。教科書問題當然是非常近代且國族的產物，但在教育的現場，抑或正在閱讀歷史文本的時刻，對個人而言就不只是近代的時空而已，暴力記憶或許會超越時空來到讀者的跟前。本文主張，歷史敘述，特別對過去的殖民者而言仍然是很重要。

關於這一點正好呼應了，本文在開頭所強調的，敘述殖民地生活和經驗的具體狀況的重要性。臺灣原住民族的生活方式，因爲（日本教科書中尚未記載的）「理蕃」政策而被迫變化，或者以警察與「先覺者」爲中心，受到影響而主動變化。若能具體地敘述這種原住民族的日常生活、勞動、娛樂、經驗，將可深化舊殖民者的認識，且成爲分有記憶的契機。正如土井正興等人的三省堂世界史教科書一樣，若過度聚焦在引人注目的事件或民族運動上，恐怕會忽視掉民俗（folklore）層面的民眾生活與文化。我們在此也許可以想起，尊重民眾史

之家永三郎的努力。中村勝《捕囚》（2009）在敘述此種原住民族歷史時，不會馬上使用「民族」的抵抗，或是「民族運動」這種（狹義的）政治層面的名詞。而是以原住民抵抗「民屬」（德文Volk）的生活基礎（生活樣式）被破壞，這種去殖民的歷史觀點來敘述，應該對今後教科書敘述有力。本文透過對日本歷史教科書中霧社事件的（無）記載問題，希望可以探討出在這樣的去殖民運動中，日本該如何負起殖民統治的責任，以及如何與臺灣原住民族建立起新的主體關係。

謝辭：感謝郭雲萍先生修改中文拙稿，所有文責屬於筆者。調查教科書時，這次利用了福岡市教育中心、大阪府教育中心、韓國翰林大學圖書館，感謝各單位的協助。

筆者連絡方式：husv83@gmail.com



照片1：家永三郎《審定不合格日本史》三一書房，1974年。



照片2：家永三郎《新日本史》，左為1989年版，右為1968年版，韓國翰林大學「大江志乃夫日本近代史文庫」所藏。

参考文献

- 浅田喬二1973『日本帝国主義下の民族革命運動』東京：未来社
- 家永三郎1957『新日本史』東京：富山房
- 1974『検定不合格日本史』東京：三一書房
- 1995「教科書裁判の歴史的意義」教科書検定訴訟を支援する東京都連絡会編『アジアから見た日本の教科書問題』東京：かもがわ出版、91-105頁
- 板垣竜太2005「植民地支配責任を定立するために」岩崎稔、大川正彦、中野敏男、李孝徳編『継続する植民地主義：ジェンダー／民族／人種／階級』東京：青弓社、294－315頁
- 伊東昭雄、小島晋治、光岡玄、板垣望、杉山文彦、黄成武編1974『中国人の日本人観100年史』東京：自由国民社
- 井上清・鈴木正四1956『日本近代史（下）』東京：合同出版社
- 上原専祿1953『民族の歴史的自覚』東京：創文社
- 1961『世界史における現代のアジア』（増補改訂版）未来社
- 上原専祿編1960『日本国民の世界史』東京：岩波書店
- 江口朴郎1954『帝国主義と民族』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 太田昌国2008a「民族・植民地問題への無自覚：日韓条約締結のころ」『「拉致」異論：日朝関係をどう考えるか』東京：河出書房新社、52-76頁
- 2008b「『60年代』再考--精神のリレーのために（3）植民地主義と先住民族：堀田善衛の仕事を媒介に」『インパクション』165: 130-144
- 太田満2008「日本の歴史教科書の中の台湾：語られない民衆の歴史」『国際理解教育』14: 8-25
- 大槻健1963.9.「民族教育の問題：朝鮮人高校生に対する暴行事件をめぐって」『教育』13（10），161: 31-35（教育科学研究会）
- 小熊英二1998『＜日本人＞の境界：沖縄・アイヌ・台湾・朝鮮 植民地支配から復帰運動まで』東京：新曜社
- 2002『＜民主＞と＜愛国＞：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東京：新曜社
- 加藤栄一2004「日本の歴史教科書：植民地支配に関する記述」中村哲編、195-207頁
- 加藤祐三1971「1920年代末－30年代前半のアジア」『岩波講座世界歴史27 現代4 世界恐慌期』東京：岩波書店、273-283頁
- 鹿野政直編1978『ジュニア日本の歴史6 近代の日本』東京：小学館
- 柄谷行人1993[1988]「ライブニッツ症候群」『ヒューモアとしての唯物論』筑摩書房、127-162頁
- 川島真2009「日華・日台二重関係の形成：1945-49年」川島真・清水麗・松田康博・楊永明編『日台関係史：1945-2008年』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34-35頁
- 川本隆史1998「民族・歴史・愛国心：『歴史教科書論争』を歴史的に相対化するために」小森陽一・高橋哲哉編『ナショナル・ヒストリーを超えて』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57-173頁
- 北村嘉恵2011「霧社事件関連文献目録」『教育史・比較教育論考』20: 74-107
- 君島和彦1996『教科書思想：日本と韓国の近現代史』東京：すずさわ書店
- 2009『日韓歴史教科書の軌跡』東京：すずさわ書店
- 君島和彦・坂井俊樹1992『朝鮮・韓国は日本の教科書にどう書かれているか』梨の木社

- 許世楷1972『日本統治下の台湾：抵抗と弾圧』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 教科書検定訴訟を支援する歴史学研究者の会編1998『歴史の法廷：家永教科書裁判と歴史学』東京：大月書店
- 金達寿1977『日本と朝鮮：民族・歴史・文学 金達寿対談集』東京：講談社
- 毛戸祐司2004「日本の世界史教科書」中村哲編、111-132頁
- 額綱厚2008「侵略戦争・植民地支配の記憶と忘却：記憶の取り戻しとしての平和思想」『日本思想』（韓国日本思想史学会）15: 3-50
- 小島晋治1978.5「教科書の執筆者として」『季刊三千里』14: 206-209
- 1983.1「教科書問題：何が問われているか」『中国研究月報』419: 1-8
- コシュマン、ヴィクター2011『戦後日本の民主主義革命と主体性』葛西弘隆訳、東京：平凡社（Victor Koschmann. 1996. *Revolution and Subjectivit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子どもと教科書全国ネット21編（代表執筆依義文）2008『最良の「教科書」を求めて：「教科書制度」への新しい提言』市川：つなん書房
- 駒込武1996『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
- 小松裕2009『全集日本の歴史14 「いのち」と帝国日本』東京：小学館
- 佐伯有清、土井正興1963.10「朝鮮および朝鮮問題についての考え方：高校生の場合」『歴史評論』158: 8-18, 59
- 依義文2009a「世界の潮 中学校歴史教科書の採択--求められる"当たり前"の採択制度」『世界』（796）、20-24, 2009-10
- 2009b「二〇〇九年度教科書採択の検証：二〇一一年に歴史わい曲教科書を終わらせるために」『前衛』（850）、113-122, 2009-12
- 鄭在貞2007[2005]「韓日につきまとう歴史の影とその克服のための試み」三谷編、248-271頁（初出：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第182回日文研フォーラム」2005年7月12日）
- 土井正興1976『世界史の認識と民衆：大学における歴史教育を原点として』東京：吉川弘文館
- 1988「歴史教育と民族」斉藤秋男、土井正興、本多公榮編『教育のなかの民族：日本と中国』東京：明石書店、15-27頁
- 遠山茂樹、今井清一、藤原彰1959『昭和史（新版）』東京：岩波書店
- 鄧相揚（トンシャンヤン）2000『史実シリーズ① 抗日霧社事件の歴史：日本人の大量殺害はなぜ、おこったか』下村、魚住訳、大阪：日本機関紙出版センター（1998『霧社事件』台北：玉山社出版）
- 中野敏男2001「＜戦後＞を問うということ：「責任」への問い、「主体」への問い」『現代思想：戦後東アジアとアメリカの存在』7月臨時増刊号、291-309頁
- 2004「「日本の戦後思想」を読み直す（1）どこから出発したのか?：小熊英二著『＜民主＞と＜愛国＞』を批判する」『前夜』（1）、141-151
- 2005a「同上（2）連続する戦時体制の遺産/封印される戦争責任」『前夜』（2）、186-196
- 2005b「同上（3）戦争責任を受け止める主体位置：「超国家主義の論理と心理」と「中国の近代と日本の近代」」『前夜』（3）、180-188
- 2005c「同上（4）自閉してゆく戦後革命路線と在日朝鮮人運動：金斗鎔と日本共産党との間」『前夜』（4）、220-229

- 2005d「同上（5）ナショナリズムの解禁と植民地主義の忘却：日本共産党と在日朝鮮人運動とのわかれについて」『前夜』（5）, 211-222
- 2006a「同上（6）「民族解放革命」と「民族の魂の解放」：国民文学論争における野間宏と竹内好の交錯」『前夜』（6）, 224-234
- 2006b「同上（7）「方法としてのアジア」という陥穽：アジア主義をめぐる竹内好と梶村秀樹の交錯」『前夜』（8）, 208-216
- 2006c「同上（8）植民地主義批判と朝鮮というトポス：アジア主義をめぐる竹内好と梶村秀樹の交錯（その2）」『前夜』（9）, 215-223
- 2006d「植民地主義概念の新たな定位に向けて」中野敏男、波平恒男、屋嘉比収、李孝徳編『沖縄の占領と日本の復興：植民地主義はいかに継続したか』東京：青弓社、347-366頁
- 2008「戦後責任と日本人の『主体』」金富子・中野敏男『歴史と責任：「慰安婦」問題と一九九〇年代』東京：青弓社、82-99頁
- 中村哲2004a「現代東北アジアと歴史教育の役割」中村哲編、1-10頁
- 2004b「歴史教育の問題点とその改善策」中村哲編、229-244頁
- 中村哲編2004『東アジアの歴史教科書はどう書かれているか：日・中・韓・台の歴史教科書の比較から』東京：日本評論社
- 中村平2007「^{そこ ころ}「困難な私たち」への遡行：接 触 領 域 における暴力の記憶の民族誌記述」『コンタクト・ゾーン』1: 143-160（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人文学国際研究センター）
- 2008a「植民暴力の記憶と日本人の責任：台湾先住民族タイヤルと脱植民化運動の広がり」『日本学報』77: 203-220（韓国日本学会）
- 2008b「分有される植民暴力の記憶：日本人ジャーナリストによる台湾先住民族の民族誌記述」『日本文化学報』39: 249-273（韓国日本文化学会）
- 2009「圍繞原住民泰雅民族重層性去殖民化之課題：殖民統治責任與暴力『記憶的分有』」（台湾先住民族タイヤルをとりまく重層的脱植民化の課題：植民統治責任と暴力の「記憶的分有」）、「台灣與海洋亞洲」國際學術研討會（「台湾と海洋アジア」国際学術シンポジウム）にて報告、12月5日、台北：台湾大学（中国語）
- 中村勝2009『捕囚：植民国家台湾における主体的自然と社会的権力に関する歴史人類学』東京：ハーベスト社
- 西岡虎之助、鹿野政直1971『日本近代史』東京：筑摩書房
- 西川長夫2006『〈新〉植民地主義：グローバル化時代の植民地主義を問う』東京：平凡社
- 西島有厚1966「ヨーロッパ中心史観と日本中心史観の批判について」『歴史地理教育』123
- ねず・まさし1970「台湾霧社の蜂起」『日本現代史 7』東京：三一書房、69-85頁、307頁
- 野村浩也2005『無意識の植民地主義：日本人の米軍基地と沖縄人』東京：御茶の水書房
- 朴慶植1971「霧社事件」歴史学研究会編『太平洋戦争史Ⅰ 満州事変』東京：青木書店、214-215頁
- 春山明哲2008『近代日本と台湾：霧社事件・植民地統治政策の研究』東京：藤原書店
- 林えいだい編1995『写真記録 台湾植民地統治史：山地原住民と霧社事件・高砂義勇隊』福岡：梓書院
- 星徹2010.12「教科書は誰が決めるべきか：横浜市『歴史』教科書採択から検証する」『世界』811: 248-255
- 松永正義2008[1993]「日本における台湾文学の研究について」『台湾を考えるむずかしさ』東京：研文出版、95-121

- 頁（初出：『言語文化』（一橋大学）30）
- 三澤真美恵2010『「帝国」と「祖国」のあいだ：植民地期台湾映画人の交渉と越境』東京：岩波書店
- 三谷博編2007『日本の教育と社会6 歴史教科書問題』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
- 三橋広夫1999「中学校の授業：台湾に向き合って学ぶ近現代史」『歴史地理教育』602: 48-51
- 向山寛夫1987『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湾民族運動史』中央経済研究所
- 村井淳志1986「上原専祿の教育観と国民観」『教育科学研究』5: 27-36
- 森口洋一1996「植民地支配をどう扱うか：台湾を例に（特集/日本の植民地）」『歴史地理教育』551: 30-35
- 森宣雄2001『台湾／日本：連鎖するコロニアリズム』東京：インパクト出版会
- 山辺健太郎編1971『現代史資料22 台湾（2）』東京：みすず書房
- 尹健次1994『民族幻想の蹉跌：日本人の自己像』東京：岩波書店
- 1997『日本国民論：近代日本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東京：筑摩書房
- 2007「歴史認識を考える：藤間生大『民族の詩』を出発点に」『アソシエ』19: 168-176
- 楊杏庭1959.2「台湾の民族運動：霧社蕃の反乱」『歴史教育』7（2）：16-24（歴史教育研究会）
- 吉田裕2010「なぜ日本は『侵略』という認識をもたなかったのか：戦後日本社会のなかの中期連」岡部牧夫、荻野富士夫、吉田裕編『中国侵略の証言者たち：「認罪」の記録を読む』東京：岩波書店、137-163頁
- 吉田正生2007「中学校社会科歴史教科書に現れたアイヌ民族関係記述について：第2章 表象のアリーナ」『北海道教育大学紀要（教育科学編）』57（2）：141-155
- 和田春樹1981[1976]「非暴力革命と抑圧民族：日本人にとっての三・一運動」『韓国民衆をみつめること』東京：創樹社、39-74頁（初出『展望』1976.9）
- Anderson, Benedict.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 and extended ed. London, NY: Verso.
- Keenan, Thomas. 1997. *Fables of Responsibility: Aberrations and Predicaments in Ethics and Politic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Rwei-Ren, Wu. 2003. *The Formosan Ideology: Oriental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1895-1945*. Thesis (Ph. D.) , University of Chicago.
-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1988.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eds.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71-313.